

1945 年以来关于纳粹屠犹的著述和研究*

马丁·吉尔伯特 文 王雪梅译 宋立宏校

我从事纳粹屠犹研究的决心始于 1959 年参观特雷布林卡，当时特雷布林卡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荒凉之地。为了去那里，我不得不说服一位波兰农民划船带我渡过布格河，然后用马车把我带到那个荒凉的目的地。我第一本关于纳粹屠犹的著作出版于 1979 年，而今年早些时候我出版了这方面最新的——第 7 本——著作。¹

每一位研究纳粹屠犹的历史学家，无论工作如何努力，也不管从事这一研究的时间有多长，都要依赖于许多其他人的研究和著述：依赖那些出版或者未出版的档案或书本形式的各种文献、前人的著作和文章、幸存者的证词。今天的讲演就是一份礼物，送给那些为每一位在纳粹屠犹研究材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即送给成百上千的文献工作者和图书管理者、学者和纳粹屠犹幸存者的一份礼物。

首先，我要提前向今天晚上我没有提到的那些著述及研究的作者和纳粹屠犹见证人道歉。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高度重视他们，也不表示我没有将它们包括在自己的参考书目中。在 1987 年首次出版的《纳粹屠犹：犹太人的悲剧》(*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一书中，我附有长达 65 页的参考注释。² 对大多数的纳粹屠犹研究者来说，这样做非常典型。即使在 14 年前，纳粹屠犹的参考书目在范围和细节上也是令人生畏的。

今天晚上，我的考察从集中营解放后开始。当时是 1945 年夏天，幸存者的名单开始出现在著作和媒体上。达豪集中营（解放后成为一个难民营）就以希伯来文《幸存者》(*Sharit Ha-Platah*) 为题公布了五卷名单。这些名单给出了幸存者的姓名、出生地和出生日期。这里的幸存者不仅仅是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还包括布痕瓦尔德、贝尔根—贝尔森、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及许多其他下属集中营的幸存者。³

这五卷名单都是用模版复印机印刷的——每次印刷几百份，相当于战后的复印机。战争刚结束的很短时期内，基本没有印刷书本的设备，但是一种紧迫感促使他们找到幸存者并与之取得联系。达豪集中营公布的名单很早就暗示了纳粹屠犹涉及地域的广泛性。在《纳粹屠犹地图集》(*Atlas of the Holocaust*) 中，我就以这些名单为基础做了两幅地图。⁴ 名单上的大多数人来自波兰中部和匈牙利，少数人则来自远至阿姆斯特丹、罗马、科孚、罗德岛甚至基辅的地方。其中还有一名幸存者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斯威辛出生。

早在 1946 年最初几个月中，关于纳粹屠犹的出版物就已开始出现，虽然这些出版物经常印刷在当时的劣质纸张上，如今这些出版物一碰就碎。在布加勒斯特，世界犹太人大会罗马尼亚分部出版了附带照片和文件的《对雅西犹太人的屠杀》(*Le Massacre des Juifs de Jassy*)，此书描述了 1941 年 6 月和 7 月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屠杀 4000 名犹太人的令人恐怖细节。在《最后的旅程：纳粹欧洲的犹太人的命运》(*Final Journey: The Fate of the Jews in Nazi Europe*) 这本书中，我用这一早期出版物作为“从雅西出发的旅程”这一章的部分材料。

* 中译文对演讲开头寒暄性质的讲话略有删削。——译注

¹ 这些书是：*The Fate of the Jews in Nazi Europe* (1979);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1981); *Atlas of the Holocaust* (1982);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1987); *The Boys: Triumph over Adversity* (1996); *Holocaust Journey: Traveling in Search of the Past* (1997); *Never Again: 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2000).

² 在美国，本书书名是 *The Holocaust: The Fate of the Jew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³ Volume one, Dachau; volume two, Buchenwald and its subcamps; volume three, Bergen-Belsen, Salzwedel, Gardelegen, and Theresienstadt; volume four, Dachau, Mauthausen, Celle, Innsbruck, Braunschweig, Mannheim, Regensburg, Linz, and Buchenwald (后者的名单完全由 16 和 17 岁的孩子的名字组成); volume five, Dachau, Feldafing, Allauch, and subcamps in southern Bavaria.

⁴ 即地图 310，“达豪集中营一些幸存者的出生地”；以及地图 311，“更多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

⁵ 当时 4300 名犹太人被装在两列密闭火车上，向南行进了 250 英里，其间有 2650 名犹太人死去。

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出版物刊登了罗马尼亚警察的报告，其中列出了货车在每个站台出发时犹太人死去的数量。在罗马站上，当地一位基督教妇女维奥利卡·阿加里奇，即当时宗教红十字会的领导，坚决要求采取措施减轻犹太人旅途的痛苦。她的干涉无疑减小了犹太人的死亡率。在有关非犹太人中的义人（也称之为“民族义人”）的一些故事中——目前正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相关的书——她也非常受人尊敬。这位 55 岁的罗马尼亚非犹太人，在过去的 45 年中曾受到雅德瓦谢姆（Yad Vashem）的荣誉表彰。

1946 年在瑞典马尔默刊载了另一批名单。我以这些名单为基础做出了《纳粹屠犹地图集》中的另一幅地图，题目叫做《1945 年获得解放的犹太人来到瑞典》。这批名单中包括一些犹太妇女，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下属机构的资助下，她们到达瑞典，但由于过于虚弱，尽管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挽救，她们还是去世了。这些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和南斯拉夫。他们中有来自琴斯托霍瓦的 16 岁的布罗尼斯拉瓦·多尔夫曼，来自贝雷加扎兹的 20 岁的罗扎利亚·卡茨以及来自布达佩斯的 17 岁的胡迪特·山多尔。与《纳粹屠犹地图集》一样，这些妇女（以及更多女人）也在瑞典的这份名单中享有“一席之地和一个名字”。⁶

1946 年是战后完全和平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版了一些书，包括埃德尔曼关于华沙隔都起义的书（Marek Edelman, *The Ghetto Fights*），在纽约以英文出版，早先在华沙曾以波兰语出版；贝迪纳兹关于海乌姆诺死亡营（1941 年 12 月开始投入使用）的书（Wladyslaw Bednarz, *Das Vernichtungslager zu Chelmno am Ner: The Extermination Camp at Chelmno (Kulmhof)*），在华沙以德语和英语出版；塔巴布拉特关于罗兹隔都命运的书（Israel Tabakblatt, *Khurban Lodz*），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意第绪语出版；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iedman）关于奥斯威辛的叙述，在波兰城市比得哥什以波兰语出版（弗里德曼是纳粹屠犹幸存者，后来成为纳粹屠犹研究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达特纳的书（Szymon Datner, *Walka i Zaglada bialostockiego ghetta*）在罗兹以波兰语出版，此书描述了比亚韦斯托克隔都起义的详细细节；玛里亚·霍赫贝格尔-玛里安斯卡也编辑了一本波兰语的书（Maria Hochberg-Marińska, *Dzieci Oskrzaja*），这是当时居住在华沙一个犹太孤儿院的犹太儿童幸存者的证词——但直到 50 年后才以《儿童的控诉》（*The Children Accuse*）为题用英文出版。同样在 1946 年出版的还有魏因赖希的《希特勒的教授》（Max Weinreich, *Hitler's Professors: 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此书最初在纽约发表在两期连号的 *YIVO-bleter* 杂志上，这是隶属于意第绪科研所⁷的杂志，随后又以英文出版。此书绝版几十年后，耶鲁大学在 1999 年发行了新版平装本。⁸

在《希特勒的教授》中，魏因赖希勇敢指出：“我们将要证明的是，德国学者在希特勒时代自始至终都与犹太人的谋杀者密切勾结。德国政府 1933 到 1945 年的一些灌输性作品公开叫嚣‘无论什么时候遇到犹太人都要予以灭绝’。这些作品中重复使用了学术著作中包含的‘史实’（facts）和‘原因’（reasons）等字眼。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之看作实际下达的死亡命令。”

魏因赖希辩论说，从 1919 到 1933 年，“只有少数德国学者从理性上反对当时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他描绘了德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菲利普·雷纳德（Phillip Lenard）从

⁵ 1979 年在英国、美国和荷兰出版

⁶ 我的地图名字叫做《1945 年 5 月到 11 月间在瑞典死去的集中营女幸存者》（地图 308）。引文是“Yad Vashem”典故的出处。

⁷ “意第绪科研所”（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后来改名为“YIVO，犹太研究所”（YIVO, the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⁸ 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附有马丁·吉尔伯特写的前言。

1924 年起就支持希特勒的细节。他还引用了另一位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内斯·斯塔克 (Johannes Stark) 1935 年在雷纳德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我很高兴在今天回忆我和雷纳德在 1928 或者 1929 年的谈话。当时我以一种悲伤的语气向他解释犹太人在商贸、经济、政治、媒介以及学术上的影响是多么大。雷纳德双眼发光，挥舞着双臂说：‘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必须坠入地狱中心的原因。’”

对于研究者来说，一种必要的材料来自战犯法庭审判和质询的证据。1946 年，在卢布林，几个地方犹太历史委员会为了调查纳粹罪行，让赫尔茨曼 (Chaim Hirszman) 作证。他是贝乌热茨两个仅有的幸存者之一。1946 年 3 月 19 日，他出庭作证，然后准备回家，准备第二天出庭作证的证据。就在离开法庭时，他受到波兰反犹太主义者的攻击和谋杀——当时就在法庭范围内。第二天，他的遗孀普拉来到法庭。她在解放后嫁给他。她说她丈夫自从结婚以来除了贝乌热茨，就没说过任何别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孩子都在贝乌热茨遇害）。她能够根据他曾告诉她的事情作证吗？法庭认为可以。于是她就作了证。她和她丈夫的证词都保存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所中。4 年后，在《纳粹屠犹：犹太人的悲剧》中，我发表了他们两人的证词。

从 1947 年一直到 1953 年，纽伦堡审判的记录和文件陆续出版，最初的 42 卷在纽伦堡出版，随后的 15 卷在华盛顿出版。所有 57 卷⁹构成以后关于纳粹屠犹中谋杀者的所有历史著作的基础。1961 年汉斯·弗兰克 (Hans Frank) 日记在华沙出版，这使得纽伦堡法庭上更令人震惊的文件、一个主要谋杀犯的观点、量化和证实纳粹屠犹的文件能够以书本形式出现。

对纽伦堡审判档案的充分利用始于以下著作。1953 年赖特林格的《最后解决》(Gerald Reitlinger, *The Final Solution: The Attempt to Exterminate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1958 年利物浦的罗素勋爵的《纳粹党党徽的祸害》(Russell, *The Scourge of the Swastika: A Short History of Nazi War Crimes*)；1971 年希尔伯格的开拓性著作《毁灭的档案》(Raul Hilberg, *Documents of Destruction: Germany and Jewry, 1933-1945*)。1976 年，希尔伯格的著作出版 5 年后，耶路撒冷出版了关于纽伦堡审判档案的全面介绍性著作。¹⁰纽伦堡审判档案描述了灭绝犹太人时令人作呕的丰富细节。1982 年，我从 50 多份纽伦堡审判档案中寻找资料作为《纳粹屠犹地图集》中几幅地图的主要参考材料。这些材料提到 1938 年 10 月德国驱逐波兰生的犹太人；1941 年 8 月谋杀苏联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州的犹太人；别动队的报告——后来被雅德瓦谢姆以书的形式出版；1941 年 10 月被驱往毛特豪森的 400 名荷兰犹太人的死亡——后来得知其中包括杰出捷克药理学家埃米尔·斯塔肯斯坦，他早先跑到荷兰避难；1944 年夏天犹太人从匈牙利被驱逐；1947 年 6 月 6 日保罗·布洛贝尔 (Paul Blobel) 关于他的 1005 部队毁灭大量证据的书面陈述。

1947 年有关利沃夫犹太人命运的波兰语著作 (*Zagłada Żydów Lwowskich*) 在慕尼黑出版，菲利普·弗里德曼的开拓性工作随之取得深入进步。弗里德曼将一些文章和著述收集成《通向灭绝之路》(*Roads to Extinction: Essays on the Holocaust*)。其中包括利沃夫犹太人和犹太人抵抗运动的文章，并于 33 年后的 1980 年在纽约和费城出版。另一先驱性著作梅纳谢的《比克瑙(奥斯威辛 II)》(Albert Menasche, *Birkenau (Auschwitz II): Memoirs of an Eyewitness: How 72,000 Greek Jews Perished*) 于 1947 年在纽约出版。1948 年，在苏黎世，列瓦伊出版了《匈牙利犹太牺牲者黑皮书》(Eugene Levai, *Black Book on the Martyrdom of Hungarian Jewry*)。后来，其它地区这一人类灾难的情景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

1952 年，贝恩斯坦 (Tatiana Berenstein) 出版了 11 份关于华沙和华沙所有犹太社区中犹太人被迫集中居住、受驱逐和毁灭情况的统计图表，从而推进了人们对纳粹屠犹细节的了

⁹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e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fficial Texts* (42 volumes), Nuremberg, 1947-49 and *Trial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15 volumes) Washington D. C., 1949-53.

¹⁰ Jacob Robinson and Henry Sachs (editors), *The Holocaust: The Nuremberg Evidence, Part One: Documents*.

解。这些图表发表在《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通讯》(*Biuletyn Żydowskiego Instytutu Historycznego*)上。5年后贝恩斯坦又在同一杂志发表了10份卢布林地区犹太社团毁灭的图表。10年后,她又发表了东加里西亚地区139个犹太社团中犹太人被迫集中居住、受驱逐和毁灭情况的12份统计图表。

在那份杂志中,还有三名波兰犹太历史学家发表了统计图表。达布罗夫斯卡(Danuta Dabrowska)在1995年出版了罗兹和沃森兰德(Wartheland)其它城镇和村庄犹太人被迫集中居住、受驱逐和毁灭情况的16份统计图表;鲁布科夫斯基(Adam Rutkowski)也在1995年出版了拉多姆和包括凯尔采(Kielce)的拉多姆地区的13份统计图表;1996年,达特纳(Szymon Dantner)出版了比亚韦斯托克及比亚韦斯托克地区的8份统计图表。这些统计表目前仍然是研究犹太人受驱逐的时间和数目的一个基本指南:它们绘制了波兰犹太人被系统、全面和小翼翼地灭绝情况的图表。

1953年,来德雷尔出版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隔都》(Zdenek Lederer, *Ghetto Theresienstadt*),列出了驱逐犹太人的每列火车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和走向死亡营情况的详细清单,上面记载着每列火车上犹太人命运的大量细节。在这些犹太人中,一些被运往里加,一些被运往特雷布林卡,更多的被运往奥斯威辛。来德雷尔认为,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运出去的23,500名犹太人的目的地和死亡地是马利·特罗斯特奈斯(Maly Trostenets, 离明斯克11英里远)。每一列去往马利·特罗斯特奈斯的火车都满载1000名犹太人,这些人无一幸存。在最近的《永不再发生:纳粹屠犹的历史》(*Never Again: 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中,我画出了一幅关于这些驱逐点的地图。目前,马利·特罗斯特奈斯仍然有待历史学家调查和研究。《纳粹屠犹:犹太人的悲剧》中关于马利·特罗斯特奈斯的参考书目包括1984年在列宁格勒一个被拒绝移民的历史学家科特勒(Igor Kotler, 目前在洛杉矶的纳粹屠犹基金会)所给的材料。

对所有纳粹屠犹历史学家来说,令人痛苦的材料是死者的日记。沙夫(Rafael Scharf)出生于克拉科夫,战争爆发前来到英国,他在最近的回忆录中写道:

一方面,德国人至少在选择受害者方面是不幸的。“圣书之民”都是有文化、有信仰的人。他们普遍且绝对具有以写作方式记录并留下历史痕迹的使命感。他们惧怕犹太人作为证人和受害者的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不为人所知或者得不到信任,这种恐惧甚至比对他们自身生存的考虑还要多。在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之前,哈伊姆·卡普兰的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死了,我的日记会怎样呢?”

《苦恼书卷:哈伊姆·卡普兰的华沙隔都日记》(*Scroll of Agony: The Warsaw Ghetto Diary of Chaim A. Kaplan*)于1965年在纽约发表。¹¹早在12年前的1953年,安妮·弗兰克日记的英文版就得以出版。1972年,以色列一个出版社(Kibbutz Lohamei Ha'Gettaot)出版了作家、诗人卡兹内尔森日记的英文版(Yitzhak Katznelson, *Vittel Diary, 22.5.43-16.9.43*)。卡兹内尔森从维泰勒(位于法国南部)被带回波兰,并和他的长子一起在奥斯威辛被杀。早在一年半前,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就在特雷布林卡被害。德国人还将几百名犹太人带到维泰勒。表面上,这些犹太人是转往南美,因为他们都持有前往南美的护照,但实际上被带往奥斯威辛。这只不过是我在《奥斯威辛和同盟国》(*Auschwitz and the Allies*)中描述的一个插曲。

1973年,伊兹科沃克·鲁达舍维奇所著《维尔纳隔都日记》(Yitskhok Rudashevski, *The Diary of the Vilna Ghetto, June 1941 – April 1943*)在特拉维夫出版。鲁达舍维奇记录了发生在1943年4月5日的一件事。300名来自索尔和斯莫尔贡的犹太人被驱逐到波那利。他们

¹¹ 由Abraham I. Katsh编辑和翻译。增订本由Collier Books于1972年出版。这部绝版已久的著作于1999年被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和纳粹屠犹美国纪念博物馆联合再版。

被告知要在科夫诺隔都“重新定居”。一到达波那利，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受骗了。当时 15 岁的鲁达舍维奇在到达维尔纳几小时后就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就像临死前的动物一样，开始绝望地击打火车车厢，他们打破了粗铁丝加固的窗户。在逃跑过程中，几百人被击毙。很长一段铁路上满是尸体。”

也是在 1973 年，一些犹太人的日记被收集和出版。这些犹太人曾经是特遣队成员，在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火葬场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为了记载他们所见到的事情做出极大努力。他们把自己写的东西藏在热水瓶和罐子中，然后埋入地下。战后发现了一些日记。经过编辑，它们由奥斯威辛博物馆以《在犯罪的噩梦中》(Jadwiga Bezwinska and Danuta Czech, eds. *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Manuscripts of Members of Sonderkommando*) 为题出版。

这些特遣队成员日记的影响是如此大，以致让我对该选哪一段犹豫不决。我曾从莱韦陶的 (Salmen Lewental) 日记中选过一个简短摘要。这份日记埋藏了近 20 年，于 1962 年从比克瑙地下发现。日记中写道：

许多女孩在周围或站或坐，她们低着头，保持了顽固的安静，极其反感地看着这个卑鄙的世界，特别是看着我们。

其中一个女孩说：“我还如此年轻，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什么，为什么这种死亡会降临在我头上？为什么？”她这样低声念叨着，后来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说：“一个人应该比这活得更长一些的。”

说完这些话，她凝视着远处某个地方，陷入忧郁的幻想；不断闪烁的眼光中带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

1981 年，《卢比诺维奇日记》(*The Diary of Dawid Rubinowicz*) 在爱丁堡出版。¹²这是一个小男孩对博曾滕 (Bodzentyn, 波兰的一个村庄) 中的孤立险境的陈述。在 1942 年 6 月 1 日，他写道：“今天早上两个犹太女人，一个妈妈和她的女儿，逃到乡村。不幸的是，德国人正好开车从鲁德基 (Rudki) 到博曾滕去买土豆，他们碰到这两个女人。两个女人一看见德国人就开始逃跑。但很快被赶上就擒。”卢比诺维奇还说：“德国人想在村庄里当场将她们击毙，但是市长不同意。然后他们就把两个女人带进森林，在那里开枪打死。犹太警察立即赶过去将她们埋葬。手推车回来后，上面全是血。他们……”就在这里，卢比诺维奇的日记结束了。他不到 15 岁。

未能幸存下来的人的日记数量很大。一位叫格罗伊诺夫斯基 (Yakov Grojanowski) 的波兰犹太人于 1942 年 1 月从海乌姆诺死亡营中逃出，写了一本日记。我发现许多书的脚注提到他的日记。这促使我寻找日记原文。1985 年，我收到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寄来的整本日记的影印本，深受震惊。格罗伊诺夫斯基刚刚逃出，还处在附近格拉波 (Grabow) 村拉比的庇护下时，就整理编撰了这本日记。在《纳粹屠犹：犹太人的悲剧》中，我以 26 页的篇幅全文发表了这份日记，使其自成一章，名为“大规模谋杀的目击者”。

海乌姆诺的犹太囚徒被用来搬运毒气车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尸体，并把这些尸体放进坑里。1942 年 1 月 8 日的日记中，格罗伊诺夫斯基记录了看守如何命令他和他的奴隶劳工同伴唱歌：

我说：“朋友们和受尊敬的人们啊，我们现在应该唱‘希望’ (Hatikvah)。”于是我们用东西盖住头，唱起了圣歌。听起来就像一次祈祷。唱完后宪兵离开，用三把锁锁住了门。

我们不禁哭了起来，都说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野蛮。他们以如此谋杀的方式消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还强迫我们在尸体上面唱歌。我希望他们像‘哈曼’一样死去。全能的

¹² 由 Derek Bowman 编辑和翻译。

上帝会结束这种可怕的命运。

来自伊兹比察的知名人士摩西（Mosche Asch）说：“我们是牺牲祭品，预示了弥赛亚时代即将来临。”

格罗伊诺夫斯基也未能幸存。据说他可能是在华沙犹太人的一次起义中遇害的。

不仅仅是日记，死者的诗歌也提供了洞察屠杀现实的材料。卡兹内尔森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儿童写轻松的诗歌而著名。他曾以令人难忘的词句写下了“致遇难犹太人之歌”：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令人忧伤的梦，
我的人民毁灭了
不留下任何人，不留下任何人！

悲哀啊！悲哀！我发出呻吟，
梦境竟然是真的！我呻吟着流泪。
我颤抖着呼喊，哦，上帝啊，高高在上的上帝！
我的人民死了！何以至此？又为什么？¹³

今晚走进这个演讲厅之前，我在附近走廊上看到卡兹内尔森令人难以释怀的话语：“孩子首先被消灭。他们身上本来可以出现一个新的黎明。”

最近几年，盖比尔提格（Mordechai Gebirtig）的诗歌出了两个版本，一个由施奈德在美国出版，另一个由赖希特尔在以色列出版。¹⁴盖比尔提格的诗歌是来自正处于毁灭世界中的痛苦哭喊。随着克拉科夫隔都的建立，他跑到附近一个村庄躲藏了一年。他为克拉科夫写了一首意第绪语诗歌《别了，我的克拉科夫！》：

别了，我的克拉科夫。
别了。
马和马车等在我房舍前面。
凶狠的敌人将我赶出来。
就像驱赶一条狗
不带任何怜悯。

别了，我的克拉科夫，
今天我可能是
最后一次见到我亲爱的一切了。
在我妈妈的坟前，
我发自内心痛哭。
与她分离非常困难。

¹³ 引自 Yitzhak Katznelson, *Vittel Diary*, 22.5.43-16.9.43, 由 Myer Cohen 博士翻译。1977 年，Miklos Radnoti 的战时诗歌用英文出版，题为 *The Witness*，由 Thomas Orszag-Land 从匈牙利语翻出。Radnoti 在 37 岁时，在 1944 年 8 月死去。

¹⁴ Gertrude Schneider (editor), *Mordechai Gebirtig: His Poetic and Musical Legac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and Sinai Leichter (editor), *Anthology of Yiddish Folksongs*, volume 5, “The Mordechai Gebirtig Volum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2000.

我哭干双眼
直到没有一滴眼泪。
泪水打湿了爸爸冰冷的墓碑……¹⁵

1942年1月，盖比尔提格回到克拉科夫隔都。1942年6月4日，在一次驱逐犹太人行动中，他被德国人的一枚子弹射死。时年65岁。

1958年，爱德华·科索伊（Edward Kossoy）在慕尼黑完成了他对纳粹屠犹研究的一项卓越贡献。这项贡献只有3页：仅仅3幅单张地图。第一幅地图上面配有日期和数据，标明了驱逐犹太人的路线，包括奥地利、斯洛伐克、布科维纳、鲁塞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Banat）、巴克斯卡、塞尔维亚，内附地图标示出集中营、劳动营，以及意大利的收容营。第二幅地图则标出了波兰全境的集中营和劳动营，内附地图标示了法国、特兰斯尼查里亚（Transnistria）、北非、上西里西亚和华沙地区的集中营。第三幅地图也配有日期和数据，标示了集中营、劳动营和驱逐犹太人的路线，包括“普通政府”、波罗的海诸国、上西里西亚、西普鲁士的但泽、东普鲁士和沃森兰德。

这3幅单页地图的出版首次表明了驱逐犹太人、犹太集中营和劳动营系统的规模。¹⁶ 20年后，当我开始写316幅地图的《纳粹屠犹地图集》时，科索伊的著作给了我灵感。1958年科索伊还出版了一本手册，包括集中营的刺青号码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犹太人的地域来源，1945年后被解放的犹太人的收容营的名单，以及战争期间犹太人神圣节日的日期。后一点在后来成为绝对关键性的指导，因为许多幸存者都根据斋戒日或其它节日来记载事情的时间：例如1941年普珥节，1942年逾越节，1943年赎罪日，或者是1944年哈努卡节。

1959年，另一项非凡的著作开始出版。这年，达努塔·捷克（Danuta Czech）以文章形式出版了“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大事记”（“*Kalendarium der Ereignisse im Konzentrationslager Auachwitz Birkenau*”）——达努塔·捷克本人曾是塔尔诺地区波兰抵抗运动的成员，此文在接下来5年中继续在连续8期的《奥斯威辛记事簿》（*Hefte von Auschwitz*）上出版，这是奥斯威辛国家博物馆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目的之一在于记录每列火车到达奥斯威辛的日期和车上犹太人的命运，以及所有逃跑事件的细节。¹⁷ 奥斯威辛的这些消息——不同的驱逐行动，用毒气毒死犹太人的程序——是怎样、并在什么时候由于三次逃跑事件（即 Jerzy Tabau, Rudolf Vrba 和 Alfred Wetzler, 以及 Czeslaw Mordowicz 和 Arnost Rosin 的逃跑）而传到西方，而西方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消息的，这些构成我的著作《奥斯威辛和同盟国》（*Auschwitz and the Allies*）的核心内容。

在战争正在进行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很短时间内，各个城镇的犹太人就着手写书记载自己的命运。找到有特殊经历的幸存者、回想战前犹太人的生活、试图创立毁灭犹太人的年表、讲述犹太个体及整个社区命运的决心，促使他们出版这些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大都以意第绪语、用许多不同的体例写成，从薄薄的小册子到上百页的书不等。这些回忆录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收藏在美国纳粹屠犹纪念馆的图书馆中。每一本都增加了所发事件前所未知的细节。1968年，拉斯克编辑的《卡利什之书》（I. M. Lask, *The Kalish Book*）在特拉维夫出版。此书描述了第一次大规模毒杀犹太人的细节：1940年10月，纳粹将犹太养老院的290名男女从卡利什用车运到附近的威尼利森林，并告知要把他们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城市帕德尼西（Padenice）。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列车到达森林时，车里的人都已死了，是被故意排入车内的废气毒死的。1980年，我参观了这些森林，在那里画出一幅车子行进的路线图，后

¹⁵ 我要感谢 Gertrude Schneider 允许我引用他在 *Mordechai Gebirtig: His Poetic and Musical Legacy* 一书中的翻译。

¹⁶ 它们题为 *Judenvernichtung in Donauraum, Polen 和 Polen und Balticum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¹⁷ Danuta Czech 的清单最终用英文以书的形式在1990年出版，书名叫 *Auschwitz Chronicle, 1939-1945*。其855页内容包含了非常详细和丰富的学术成果。

来发表在《纳粹屠犹地图集》中。¹⁸

1973年,《普什蒂克——纪念普什蒂克犹太社团》(*Pshitik. A Memorial to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Pshitik*)在特拉维夫出版,编辑什托克菲斯(David Shtokfish)辑录了1937年普什蒂克集体迫害的细节。当时,尽管犹太人进行了有力的自卫反抗,把波兰攻击者赶出小镇中心,但仍有3名犹太人在郊区房子中遇害。正是这次集体迫害激发盖比尔提格写出歌曲《我们的城镇在燃烧!》,短短几年内它就被规模大得多的灭绝的幸存者广为传唱。歌词最后几行是劝诫:

不要抄着手冷眼旁观,
而且还连连摇头。
不要抄着手冷眼旁观,
在大火弥漫之际!

在战后30年中,出版了400多部纪念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纪念的是波兰城镇,但也有一部分纪念其它城镇,包括南斯拉夫的松博尔和希腊的萨洛尼卡。这些书中每一本都成为纳粹屠犹历史的缩影。1983年,库格尔巴斯和博亚林从这些著作中编选了一部文集《来自荒废的花园》。¹⁹

1957年,在耶路撒冷,雅德瓦谢姆出版了第一期《雅德瓦谢姆研究》(*Yad Vashem Studies*)。这将成为纳粹屠犹研究的首要杂志。第一期中,克尔米什(Joseph Kermish)在文章中描述了华沙犹太居民委员会把税强加在面包票上的细节,这种税不仅向较宽裕的犹太人征收,还向穷人和失业的犹太人征收。

华沙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角色问题——其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宁可自杀也不把犹太孤儿院的孩子交出去——随着斯隆编辑的《华沙隔都笔记:以马内利·林格尔布鲁姆的日记》(Jacob Sloan, ed. *Not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The Journal of Emmanuel Ringelblum*)于1958年在纽约出版而受到高度重视。随后出版的林格尔布鲁姆的日记,以及林格尔布鲁姆的其它著述无需经过共产主义时代的审查制度,所以在关于战时事件记录者的排名中给予他很高地位。1974年,克尔米什和科拉克维奇编辑了林格尔布鲁姆在华沙隔都的著作,名叫《以马内利·林格尔布鲁姆:第二次世界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Joseph Kermish and Shmuel Krakowski, eds. *Emmanuel Ringelblum: Polish-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1986年,克尔米什编辑了《荣耀地生,荣耀地死!》(Kermish, ed. *To Live with Honor, and Die with Honor!: Selected Documents from Warsaw Ghetto Underground Archives "OS" ("Oneg Shabbath")*),其中包含林格尔布鲁姆帮助收集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²⁰

1972年,特伦克在纽约出版了综合性著作《犹太居民委员会:纳粹占领下东欧犹太人的委员会》(Isaiah Trunk, *Judenrat: The Jewish Councils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Nazi Occupation*),此书赢得国家图书奖。它调查了犹太居民委员会许多不同的反应,包括那些积极组织抵抗的委员会的反应。特伦克描述了隔都委员会主席由于拒绝执行德国命令最终被枪杀的细节。特伦克的著作出版两年后,随着多布罗兹奇就罗兹隔都日记而编辑的《洛兹隔都编年史》(Lucjan Dobroszycki, *Chronicle of the Lodz Ghetto 1941—1944*)的出版,关于犹太委员会的文献日益增多。在多布罗兹奇的著作中,有争议的哈伊姆·鲁姆科斯基成为中心人物。1979年,亚当·切尔尼亚科夫日记的第一个英文版本出版。与美国纳粹屠犹纪念馆合作之后,此书刚刚再版。

¹⁸ 第54幅地图“帕德尼西之旅”。

¹⁹ Jack Kugelmass and Jonathan Boyarin, eds. *From a Ruined Garden: The Memorial Books of Polish Jew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年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与美国纳粹屠犹纪念馆联合出版了增订第二版。

²⁰ 林格布鲁姆命运悲惨:华沙隔都起义后,他和他的儿子及其他几个人躲了起来,但被出卖给德国人。

199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熬过纳粹屠犹：科夫诺隔都日记》（*Surviving the Holocaust: the Kovno Ghetto Diary*），它逐日记录了科夫诺隔都犹太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由委员会秘书亚伯拉罕·托里（Avraham Tory）记录。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晚上又把日记藏起来——许多战时文件、德国人的命令、隔都的声明等等，还记下了委员会主席埃尔克斯（Elkanan Elkes）博士写给儿子约耳和女儿萨拉的邮件，约耳和萨拉在二战爆发前去了英国。埃尔克斯博士死于1945年刚刚解放不久之时。他给自己两个孩子的信这样结尾：“你们两个要记住亚玛力人对我们所作的一切。在你们有生之年都要牢记，不能忘记，而且要把这一记忆作为神圣的见证传给后代。”

1978年，巴黎出版了克拉斯菲尔德编辑的一本名册（Serge Klarsfeld, *Le Mémorial de la Déportation des Juifs de France*），此书对那种“神圣的见证”影响深远。“编辑”一词在这里属于用词不当：因为克拉斯菲尔德破译了70多份难以辨认的战时被驱逐者的名单，他还追踪到这些人的最终命运。这本书列出了每一次用火车从法国往外驱逐的犹太人名单，这些人大多被赶往奥斯威辛。名单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在对每一次驱逐名单做的介绍性注释中，克拉斯菲尔德都描述出名单之外的额外细节，包括这些人的目击证人等。他还付出很大努力寻找每次驱逐行动的幸存者。其中有一些是逃脱者（flitzers）——即东进过程中那些成功跳下火车的人。逃脱者中有个人，名叫布雷特霍尔茨（Leo Bretholz），来自维也纳，1942年11月6日被从巴黎驱逐出来，目前住在巴尔的摩。他最近发表了回忆录《跳入黑暗：在战时欧洲逃跑的7年》（*Leap into Darkness: Seven Years on the Run in Wartime Europe*）。²¹

克拉斯菲尔德对纳粹屠犹研究的进一步贡献还包括那些从比利时（与斯泰因贝格 [Maxime Steinberg] 合编）、罗马尼亚和苏联格罗德诺被驱逐出的犹太人名单。他还编辑了表现犹太被驱逐者到达比克瑙情况的一系列有名的照片集《奥斯威辛相册》（*The Auschwitz Album: Lili Jacob's Album*）；以及令人震惊的《纳粹屠犹中的法国儿童》（*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A Memorial*），后者是他1996年和科恩、爱泼斯坦（Susan Cohen and Howard M. Epstein）一起编辑的。克拉斯菲尔德的另一出版物是大卫·奥莱雷（David Oler）的油画，描绘了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火葬场，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在最近控告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诽谤的诉讼中毁誉这些油画是色情图片。²²

1982年，我试图将克拉斯菲尔德的名单包括进《纳粹屠犹地图集》的第28幅地图。它们有“第一次巴黎驱逐中波兰犹太人的出生地点图”，“从巴黎被驱逐到奥斯威辛的保加利亚犹太人……”，“被驱逐的希腊出生的犹太人……”，“出生在北非的犹太人，被驱逐……”，“1942年8月17日被驱逐往……的4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美国出生的犹太人被驱逐……”我还根据克拉斯菲尔德的名单画了3幅地图，标明了1944年7月31日从法国驱逐到奥斯威辛的儿童姓名和出生地。这件事情发生在同盟国诺曼底登陆6个星期后，当时盟国军队——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波兰、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仍然在奋力进攻诺曼底的滩头阵地。在驱逐犹太人的最后一列火车上有1名出生在里昂的1岁儿童萨法蒂，以及5名出生在巴黎的4岁（西蒙）到11岁（玛里亚姆）之间的松布利克的儿童。

克拉斯菲尔德还出版了1944年5月15日从巴黎驱逐到科夫诺和雷瓦尔、而不是驱逐到奥斯威辛的878名犹太人的名单。这些人中只有23人幸存。遇害者中包括亚伯拉罕·谢尔谢夫奇，他于1901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其他在同一列火车上被驱逐的犹太人都在法国遭到围捕，这些人出生在雅法、萨菲德、古巴、法属北非、巴库、巴格达、大马士革和伦敦

²¹ 这本回忆录是与《巴尔的摩太阳报》专栏作家、一本关于巴尔的摩之书的作者 Michael Olesker 合著的。在1998年出版。

²² 做完这次讲演，在返回伦敦途中，我了解到克拉斯菲尔德刚刚被希拉克总统任命为 Légion d'Honneur 的官员，总统在授职仪式上说：“人人知道克拉斯菲尔德率领他创建的‘被驱逐出法国的犹太儿女联合会’所做的斗争。他是为了纪念他父亲和所有纳粹屠犹受害者而战斗的，他父亲是抵抗运动成员，在驱逐中去世，且首先是纳粹屠犹的牺牲品。”

——22岁的洛斯坦和27岁的利宾就生在伦敦)。

亚伯拉罕·谢尔谢夫奇的女儿布卢姆(Eve Line Blum)在她父亲被驱逐时才12岁。她得到被驱逐者的名单,经过调查研究后于1999年在贝桑松出版。这本书有443页,书名叫《我们是900名法国人》(*Nous Sommes 900 Français*)——这句话由一个被驱逐者刻在科夫诺监狱单间房的墙壁上。布卢姆把克拉斯菲尔德长达8页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转变成一整页甚至更多的故事,通常还配有几幅照片,详细描述出她跟踪过的这些人在纳粹屠犹之前的生活状况。

随后,新的材料又以许多不同方式出现:1961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产生了之前从未出版过的一套关于纳粹屠犹的最重要的材料,它们包括目击者和幸存者起过誓、经过交叉讯问做出的证词。尽管艾希曼审判的许多德国和纳粹的文件早在纽伦堡审判中就作为证据发表出来,但在耶路撒冷法庭中,犹太证人对纳粹屠犹每个阶段的回忆和证词仍然是新颖和广泛的。在《纳粹屠犹:犹太人的悲剧》中,我使用了50多份艾希曼审判的证词,包括格林斯潘(Zindel Grynszpan)于1961年4月25日作的证词,它描述了1938年10月波兰出生的犹太人从德国被驱逐的情况。格林斯潘陈述了驱逐情况,并把陈述寄给当时住在巴黎的儿子,最终导致儿子赫舍尔(Hershl)暗杀了年轻的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m Rath),从而给希特勒发动“碎玻璃之夜”行动找到藉口。

我用过的艾希曼审判的其它证词的记录包括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关于维尔纳隔都的证词,古特曼(Israel Gutman)关于马伊达内克的证词,贝斯基(Moshe Bejski)关于普拉绍夫的证词,佩雷兹(Aharon Peretz)博士关于科夫诺隔都儿童行为的证词,以及斯雷布尼克(Shimon Srebnik)关于海乌姆诺最后阶段的证词(后来兰兹曼为了拍摄他长达9小时的史诗电影《纳粹屠犹》[*Shoah*]而采访过斯雷布尼克)。直到1992年,艾希曼审判的记录才最终以六卷本的形式被以色列司法部出版。²³

1961年,也就是艾希曼审判那年,洛特吉希恩出版了《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毁灭》(Livia Rothkirchen, *The Destruction of Slovak Jewry: A Documentary History*)。这本文献和布雷海姆1963年出版的两卷本《匈牙利犹太人的毁灭》(Randolph Braham, *The Destruction of Hungarian Jewry: A Documentary Account*)一起,成为逐国介绍纳粹屠犹情况的典范,无论这种介绍是文献性的还是叙事性的(布雷海姆的叙事故事《种族灭绝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发表于1981年)。在随后几年,出版的介绍各个国家情况的著作包括:弗里德曼编的书(Tuvia Friedman, ed. *Dokumentensammlung über "Die Deportierung der Juden aus Norwegen nach Auschwitz"*, Ramat Gan, 1963);弗伦克编辑的书(Josef Fraenkel, ed. *The Jews of Austria: Essays on their Life, History and Destruction*, London, 1967);普雷瑟的书(Jacob Press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utch Jews*, New York, 1969);沙里的书(Frederick B. Chary,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40-1944*, Pittsburgh, 1972);托特编辑的书(Dezider Tóth, ed. *The Tragedy of Slovak Jew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Banska Bystrica, 1992);弗特尔松的书(Alex Faitelson, *Heroism and Bravery in Lithuania, 1941-1945*, Jerusalem, 1996);以及耶则加力斯的书(Andrew Ezergailis,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Riga, 1996*)。耶则加力斯的著作和约萨尼德的《罗马尼亚的纳粹屠犹》(Radu Ioanid,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The Destruction of Jews and Gypsies under the Antonescu Regime, 1940-1944*)都由美国纳粹屠犹纪念馆资助出版。今后出版这种介绍单个国家情况的著作将会继续下去。

有关集中营和死亡营的著作是纳粹屠犹著作的又一类别。这些著作包括1963年出版的韦尔的回忆录《亚诺夫斯卡道路》(Leon Weliczker Well, *The Janowska Road*),它全面介绍了利沃夫郊外亚诺夫斯卡集中营;1979年多纳特的《特雷布林卡死亡营》(Alexander Donat, *The*

²³ *The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Record of Proceedings in the District Court of Jerusalem.*

Death Camp Treblinka: A Documentary); 1980年诺维奇的主要研究索比堡犹太人起义的《索比堡、牺牲和起义》(Miriam Novitch, *Sobibor, Martyrdom and Revolt: Documents and Testimonies*)。我自己的研究包括与萨沙·佩切斯基(Sasha Pechersky)的通信集,他是索比堡幸存者之一,1984年我与他书信联系时,他住在一个苏联城市(Rostov-on-Don)中。就像我在《纳粹屠犹之旅》(*Holocaust Journey: Traveling in Search of the Past*)中描写的那样,1996年,我把我在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学生带到索比堡,在那里大声朗读佩切斯基关于索比堡起义的描述,这本身就是令人苦恼的经历,就像我们在阅读卡斯基(Jan Karski)描述在伊兹比卡·卢贝尔斯卡遭受心灵创伤的那几个小时的文字所产生的感受那样,他当时看着犹太人被装上运牲畜的敞篷车,被驱逐到最终目的地贝乌热茨。

《纳粹屠犹之旅》中还包括沃纳(Harold Werner)的回忆录。1981年,当时已定居美国的沃纳参加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一次世界纳粹屠犹幸存者集会,并为雅德瓦谢姆留下一份长达几页的证词。几个月后,雅德瓦谢姆的一位历史学家科拉克维奇向我指出了沃纳陈述的不寻常之处,他描述了一小群年轻男女试图向东躲进帕尔切夫(Parzew)森林,以进行抵抗的努力。我记下了此人地址,后来我去了他的家乡迈阿密,要求旅馆招待把我带到那个地址。但是沃纳先生不在那里。我们便开车返回迈阿密,车子开过10到12个街区后,我看到一辆车背向经过。我想那就是沃纳先生。于是我要求招待将车掉头跟着那辆车,来到同一个住房。果真是沃纳先生。他邀请我进去,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我催促他详细写自己的回忆录。此后再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

4、5年后,我收到他儿子一封信,说沃纳先生已经逝世,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手稿。我便着手帮他找出版商。结果便是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击》(*Fighting Back: A Memoir of Jewish Resistance in World War II*)。4年后,站在路旁、望着沃纳先生描述的那个村庄,我向我的大学学生读了他对70名犹太游击队向一个农场发起攻击的描述。战前这个农场属于一个叫大卫·图尔诺的犹太人。游击队员放火烧了农场,毁掉了德国人正在使用的房屋、牲畜和谷物。沃纳写道:

从正在燃烧的东西中奔跑时,我注意到有一个庞然大物在地上爬,就像一只动物一样,还发出奇怪的声音。它似乎努力要站起来,没有成功,因此又摔倒在地。我把它指给我旁边奔跑的西玛亚看,我们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人,或许还是犹太人。

于是,我们每人抓着他一只胳膊,拖着他和我们一起走。战斗继续在我们四周进行。跑出农场几英里之后,我们停下来歇了歇,看了看这个人。他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部,衣服破成碎片,已经不能站立。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有牙齿的骷髅。

从他的咕哝声中,我才发现他是我的朋友亚克尔,是大卫·图尔诺在华沙的侄子。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认不出我了。从他的咕哝声中,我了解到,他曾在牛槽底下挖了个藏身之处。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因而他能够靠牛槽里的食物和牛奶活下来。

就这样,他在那里藏了几乎一年,但是后来燃烧的房屋散发出来的热气把他从藏身之处赶了出来。

我们接着跑到莫西卡村,在那里我们把他放到一辆四轮马车上,带回我们的根据地。默尼卡剪去了他的长头发,我们也试着喂养他,但是他根本咽不下任何食物。他极度虚弱,几天后便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我们把他埋在树林中。亚克尔是一个如此好的人,后来我们还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感到悲痛。

1963年,在纽约出版的另一部专著也开创了了解和研究纳粹屠犹的更广阔领域。这就是法尔斯坦编辑的《波兰犹太医师的牺牲》(Louis Falstein, ed. *The Martyrdom of Jewish Physicians in Poland*),上面还有利昂博士和约瑟夫·特南鲍姆博士的研究,以及利奥波德·拉扎罗维

兹博士和希蒙·玛沃维斯特博士的调查和文献。这本书对 1939 年到 1945 年之间被谋杀的 2500 多名犹太医生做了传记性素描。这些医生大多被德国人谋杀，也有一部分被苏联人在卡廷（Katyn）杀害，一些是试图加入游击队的时候被苏联游击队员杀害的，另一些则是战后被波兰人杀害的。这些简短的传记有 194 页；这些把数据转变成活生生的人——转变成他们的面孔、职业和成就——的页码被蛮横地缩短了。

在这里我要读 3 个例子。其中一个关于阿布拉莫维奇。编辑对他这样写道：

作为巴拉诺维切隔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经常为犹太人提供患病证明，以使他们摆脱德国人强加的繁重劳动。空闲时间他则训练其他犹太人使用武器。后来，他领导了一次不成功的起义。德国人开始大批杀害隔都中犹太人时，阿布拉莫维奇医生逃到波利西亚森林，加入了游击队。后来，他被俄国游击队队友杀害。

我选择的第二个传记人物是出生于 1904 年的约泽夫·斯坦：

斯坦医生，精通病理解剖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华沙大学病理解剖学的助教，还是一位演讲者。德国占领期间，他被拘留在华沙隔都，在那里成为一家犹太医院的主管之一……他对于斑疹伤寒症中大脑微观病理的研究在德国病理学家中也非常有名，以致他们跑到隔都向他学习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他是组织隔都内克兰德斯汀医学校的主干力量……

他拥有巨大勇气，拒绝了逃出隔都的机会。在隔都起义中他起到积极作用。后来他与妻子一起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死于毒气室。

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被杀害的医生的任何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份名单。这也是这本书具有影响力的原因。关于尼奥曼·蔡特林的论述是这样开头的：“一位年轻的罗内区（Rowne）医生，在德国占领期间遇害。”

关于纳粹屠犹的著作都一样重要，但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提醒我提及“600 万”的时候，我们指的是 600 万个体，每个人都会给一个家庭、一些朋友、一种职业——甚至是整个人类带来好处。

1965 年，雅德瓦谢姆出版了有关纳粹屠犹之前欧洲犹太人数目的著作，它直到今天仍然是标准著作。此书以战前人口普查报告为基础，甚至列出了那些只有一户犹太家庭或者只有一个犹太人的村庄。此书书名是《纳粹灭绝的犹太人的居住地地名录》（*Blackbook of Localities whose Jewish Population was Exterminated by the Nazis*，不要把它与我稍后会讲到的《格罗斯曼·埃伦堡名录》相混淆）。

编辑雅德瓦谢姆的名录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它调查了许多国家甚至最遥远地区中，每个城市和村庄的犹太人的居住地及其人数。这本书中出现了几百个村庄，二、三十个犹太人家，甚至单个犹太家庭也被考虑在内——居住在这种地方的犹太人数目也受到关注——从而有益于将其包含在雅德瓦谢姆对失去的犹太社区的调查结果中。时间已经过去了 25 年，要了解它们的存在情况只能到那些已经绝版的书中去找，但这些书很难找到。正是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才能够《纳粹屠犹地图集》中列出沦入德国统治和纳粹政权下欧洲不同地方的一些最小犹太社区的位置。²⁴

非犹太人给予犹太人的帮助也是纳粹屠犹故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957 年，弗里德

²⁴ 这些地区包括：Sudetenland（地图 17）、the valley of the River San south of Przemysl（地图 27）、the Banat region of Yugoslavia（地图 63）、Serbia（地图 68）、Volhynia（地图 72）、Bessarabia（地图 77）、Bukovina（79），以及 Bosnia（地图 84）。

曼在纽约出版了《兄弟的看守》(Philip Friedman, *Their Brothers' Keeper: The Christian Heroes and Heroines Who Helped the Oppressed Escape the Nazi Terror*)。在差不多十年内,这一领域里只有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1966年,有关德国非犹太人帮助犹太人的一部力作在伦敦出版,即洛伊纳的《值同情乃罪恶之际》(H. D. Leuner, *When Compassion Was a Crime: Germany's Silent Heroes*)。1968年在华沙,达特纳用波兰语出版了有关波兰非犹太人帮助犹太人的简短著作《民族义人》(Szymon Datner, *Las Sprawiedliwych*)。一年后的1969年,在特拉维夫,奥地利出生的鲍明格(他是科夫诺隔都的幸存者,他的兄弟在克拉科夫隔都起义中死去)出版了《荣誉名单》(Arieh L. Bauminger, *Roll of Honour*),这是一部94页故事集,讲述了那些“义人”的故事(正如阿巴·埃班在导言中描述的那样)。也是在1969年,亚希尔出版《营救丹麦犹太人》(Leni Yahil, *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这本书不是对个体而是对整个民族正义行为的介绍。

一部突显非犹太人对犹太人帮助问题的著作是布托谢夫斯基和莱温1969年在伦敦出版的《民族义人》(Wladyslaw Bartoszewski and Zofia Lewin, *Righteous among Nations: How Poles Helped the Jews, 1935-1945*)。到1986年,特奇把布托谢夫斯基和莱温开创的整个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出版了《当光明穿透黑暗》(Nechama Tec, *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 Christian Rescue of Jews in Nazi-Occupied Poland*)。

战争爆发后,帮助犹太人的非犹太外交官的工作为恐怖的纳粹屠犹故事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方面。在科夫诺,英国领事普雷斯顿(Thomas Preston)除签署了800份合法签证之外,还为那些能够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了400份“非法”签证。驻科夫诺的日本副领事杉原千亩以及荷兰代领事茨瓦腾迪克(Jan Zwartendijk),为了使犹太人能够经由日本和荷属东印度逃出欧洲,提供了2000多份签证。当时许多人因此到达安全的上海、澳大利亚和美国。最近,这些人的成就反映在莱文的杉原传记和玛利诺的美国人瓦里安·弗莱伊传记——美国纳粹屠犹纪念馆还为他们举办了最早的一次展览——以及史密斯的弗兰克·福利的传记中。²⁵今年出版的《永不再发生:纳粹屠犹的历史》中,我介绍了这些外交官和其他外交方面营救者的详细情况,这些外交上的营救者包括葡萄牙外交官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尽管当时葡萄牙政府在挽救犹太人方面表现犹豫,他还是在德国军队临近时,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发放了大量出境签证。

随着纳粹屠犹情况的公布,同盟国对此了解多少、他们对此又做出什么反应,这些是我的《奥斯威辛和同盟国》这本书的主题。此书于1981年出版。13年前,这一领域先驱性的研究就由鲍尔(Yehuda Bauer)出版。他的文章“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When Did They Know?)发表在1968年4月的《主流》(Mainstream)上。在波兰语原文和后来的英文翻译中,鲍尔全文刊登了同盟国从华沙寄往西方的报告,描述了1941年6月到1942年4月间大约70万名被害犹太人的细节。这份报告上面只列出了一个死亡营(贝乌热茨)名字,当报告于1942年夏到达英国时,报告摘要马上就通过BBC广播出来。一份BBC的内部指示——我在BBC档案中心写书的时候发现——强调:“请高度重视这种情况。这定然会付出代价。犹太受害者将会得到补偿。”

1969年,雅德瓦谢姆出版了用希伯来文写的一系列欧洲地区情况的第一卷,根据战后的大量调查,逐个城镇和逐个村庄地展示了犹太人的命运。首先发表的是两卷本《罗马尼亚》(Romania)的第一卷。3年后,又出版了《德国—巴伐利亚》(Germany-Bavaria)。接下来在1976年出版了《波兰》(Poland: The Communities of Lodz)和《匈牙利》(Hungary)。1980年,《罗马尼亚》第二卷和波兰的第二卷(Poland: Eastern Galicia)也出版了。这个系列现

²⁵ Hillel Levine, *In Search of Sugihara: The Elusive Japanese Diplomat Who Risked His Life to Rescue 10,000 Jews from the Holocaust*, 1996; Andy Mario, *Quiet American: The Secret War of Varian Fry*, 1999; Michael Smith, Foley: *The Say Who Saved 10,000 Jews*. 似乎“10,000”这个数字成为被挽救者数量的标准;其实这并不总是反映现实。

在正在被译成英文，但遗憾的是将以简本形式出版。这些希伯来文版本用详细的图解讲述了各个地方纳粹屠犹的故事，成为最全面的百科全书式著作。²⁶

雅德瓦谢姆这个系列每一卷的词条都有助于了解犹太抵抗运动、反抗行为和个体的英雄行为。1968年，祖尔编辑的《他们在反抗》(Yuri Suhl, *They Fought Back: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Resistance in Nazi Europe*)出版。随着这一著作的出版，犹太抵抗运动受到重视。那一年，雅德瓦谢姆召开了为期5天的会议，主题是“纳粹屠犹期间的犹太抵抗运动”。会上提交的论文以及随之出现的争论，在3年后的1971年发表，题为《纳粹屠犹期间的犹太抵抗运动》(*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Manifestations of Jewish Resistance, Jerusalem, 7-11 April 1968*)。

犹太抵抗运动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和出版主体正在慢慢兴起。1974年鲁本·爱因兹坦出版了《纳粹占领下东欧的犹太抵抗》(Reuben Ainsztein, *Jewish Resistance in Nazi-Occupied Eastern Europe: With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Jews as Fighter and Soldier in the Diaspora*)，这是极具学术分量的先驱之作。1977年，科拉克维奇出版了另一部先驱性著作《波兰犹太人的武装抵抗》(Shmuel Krakowski, *Jewish Armed Resistance in Poland, 1942-1944*)。由于不愿在生前出版，吕贝特肯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毁灭和起义的日子》(Zivia Lubetkin, *In the Days of Destruction and Revolt*)直到1981年才出版。在《纳粹屠犹：犹太人的悲剧》中，我使用这本著作作为犹太抵抗和起义运动的材料之一。在我的书中，犹太人的抵抗、起义和个人英勇成为日常叙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月前，一位顶尖英国犹太历史学家在《泰晤士报》上指责我在《永不再发生：纳粹屠犹的历史》中引用了过多的关于犹太抵抗的材料，这本书于1999年6月出版，它的出版是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举办的永久性纳粹屠犹展览的开幕式联办的。

20世纪70年代还出版了另外几本名册，让所有纳粹屠犹历史学家受益匪浅。这些著作包括莫尔霍的书《纪念》(Michael Molho, *In Memoriam: Hommage aux Victimes Juives des Nazis en Grèce*)，出版于1973年的萨洛尼卡。莫尔霍给出了希腊每个犹太社区遭驱逐和遇害犹太人人数的。为了绘制1943和1944年从希腊驱逐到奥斯威辛的犹太人的地图，我采用了他的名册。²⁷1975年，莫尔霍的著作出版两年后，多纳提在米兰出版了她的书(Giuliana Donati, *Deportazione Degli Ebrei Dall'Italia*)，此书介绍了1943年9月16日到1944年12月14日从意大利到奥斯威辛的14次驱逐以及7次其他驱逐的情况，并描绘了被驱逐者的命运。

1979年，一份非常有名的清单在华沙发表。²⁸它描述了德国经管的5,877个劳动营、隔都、集中营和监狱的细节，以及波兰土地上大规模屠杀和暴行的地址，关于每个暴行的叙述还附带全面的参考书目。由于1979年相关的政治原因，此书没有包含1945年被苏联吞并的东波兰地区(包括东加里西亚、沃尔希尼亚和维尔纳地区)的情况。1979年还出版了施奈德的《进入恐怖之旅》(Gertrude Schneider, *Journey Into Terror: Story of the Riga Ghetto*)。此书列出了1941年10月18日到1942年2月6日间从德国到里加的所有驱逐行动，并描绘了被驱逐者的命运。

对单个犹太社区以及其命运的调查成为纳粹屠犹写作和研究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每年都会出现这方面的著作。1980年阿拉德出版了《烈焰中的隔都》(Yitzhak Arad, *Ghetto in Flames: The Struggle and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in Vilna in the Holocaust*)。此书列出了1941到1944年维尔纳所有“谋杀行为”(一年前的197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个人回忆录《游击队员》(*The Partisan*)，这是有关希维卡尼和维尔纳及其周围地区犹太游击活动的故事)。1981年，胡滕巴赫出版了《1933—1945年沃尔姆斯地区犹太社区的毁灭》(Henry R. Huttenbach,

²⁶ 这个系列名叫：*Pinkas Hakelillot Encyclopaedia of Jewish Communities*。

²⁷ 这些包括从萨洛尼卡被驱逐和杀害的43,850名犹太人，以及4名遭受同一命运的Kalamata渔村的犹太人。

²⁸ *Obozy hitlerowskie na ziemiach polskich 1939-1945: Informator encyclopedyczn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Worms, 1933-1945: A Study of the Holocaust Experience in Germany), 该社区在德国已经存在了 1000 年。1982 年门德尔松编辑的规模庞大的《纳粹屠犹: 18 卷精选文献》(John Mendelsohn, *The Holocaust: Selected Documents in Eighteen Volumes*) 在纽约出版。我自己的《纳粹屠犹地图集》也在这年出版, 我在这部地图集中画出 316 幅地图, 显示了战前欧洲的犹太社团、德国统治的范围、全欧洲驱逐犹太人的日期和被驱逐致死的犹太人人数。另外, 我还划分了地域, 并一一注出各隔都和城镇犹太人抵抗的情节。

20 世纪最后的 10 年中, 纳粹屠犹研究和著作的数量与质量并没有减少和降低。1990 年, 四卷本《纳粹屠犹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在纽约出版, 主编是以色列·古特曼 (Israel Gutman), 他是一名幸存者和历史学家, 其著作《华沙隔都》(*The Warsaw Ghetto*) 早在 8 年前就出版了 (1994 年他还出版了《抵抗》[*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1990 年, 雅德瓦谢姆和沃尔希尼亚犹太人联合出版了斯佩克特的《沃尔希尼亚犹太人遭受的纳粹屠杀》(Shmuel Spector, *The 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941-1944*), 这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斯佩克特的杰作包括许多关于犹太抵抗运动的材料; 在附录中, 他还列出了沃尔希尼亚地区 46 个隔都的建立和毁灭日期。在斯佩克特找到并发表的许多证词中, 有一份是以萨沙·特罗斯曼 (Isachar Trosman) 做出的, 他当时是住在罗基特诺 (Rokitno) 附近一小群沃尔希尼亚犹太人中的一员, 该地区当时处于苏联游击队保护下。特罗斯曼讲述了 1944 年赎罪日发生的事情:

背诵《柯尔·尼德莱》的时候到了, 但如果没有祈祷书的话, 谁又能全文背诵祈祷词呢? 我们经历的严峻考验曾使我们忘记了祈祷。但是当时, 就像受到一根魔棒指挥似的, 每个人都开始一起祈祷。

悲伤的声音开始充满整个房间, 似乎声音将要冲破房屋, 遍及宇宙各个角落: “在以色列之家, 我们将宽恕个人和每个社团……因为所有人都行走在恐惧之中……”

压抑的哭泣声从窗外传进来。那是那些站在外面聆听祈祷的妇女和女孩发出的声音。

祈祷的领袖经过约柜, 首先是哈伊姆·卡克, 其后是帕蒂、撒姆尔和我。

此时, 我们都回想起儿时祈祷的情景, 互相安慰着。

1991 年, 法兰克福市政当局出版了一本著作, 列出 1942 到 1945 年间因驱逐而死亡的所有莱比锡犹太人的名单。1994 年在纽约, 布劳出版了《匈牙利博奈哈德犹太人》(Leslie Blau, *Bonyhad: A Destroyed Community: The Jews of Bonyhad, Hungary*), 列出了从他所在市镇因驱逐而死亡的所有犹太人名单。2 年前, 加勒德 (John Garrard), 亚利桑那州图森的一名历史学家, 发现并且在网上公布了在布雷斯特一里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隔都内遇害的犹太人姓名。

对于纳粹屠犹研究来说, 由于苏联共产主义瓦解才出现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是 1993 年立陶宛出版的一本著作。这一著作早在 1946 年就已经出版, 但立即遭禁, 全部被销毁。该著作由爱伦堡和格罗萨曼编撰 (Ilja Ehrenburg and Vasilij Grossman, *Chronaya Kniga*), 是关于纳粹统治下苏联犹太人命运的“黑皮书”。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枯萎, 此书原来的校样在莫斯科发现, 当时这些校样被锁在克格勃档案之中。尽管有些编辑好的版本在早些时候得到印刷, 但直到 47 年后, 这一著作的全文才重见天日。

很难在更近时间内出版的著作中做出选择。这些著作非常多, 有一些特别重要。1993 年, 随着纳粹屠犹博物馆在华盛顿建立, 贝伦鲍姆出版了《世界必须知道: 美国纳粹屠犹纪念馆讲述的纳粹屠犹历史》(Michael Berenbaum, *The World Must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as T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此书给出了无数纳粹屠犹

受害者的精确信息，如果没有这本专著出版，这些人的情况就不为人知。1994年，匈牙利出版了一部多卷本著作。这本著作记叙匈牙利犹太社团的情况，早在50年前的1944年就已经编撰。编辑者原来是匈牙利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当时德国占领当局命令他们这样做。

也是在1994年，梅尔特查克（Benjamin Meirtchak）——他曾经在1939年包围华沙的战斗中在波兰军队中参战，后来指挥一支红军坦克队——在以色列波兰犹太退伍军人联合会资助下，在特拉维夫出版了六卷本著作的第一卷。这一著作列出了1939到1945年间波兰犹太士兵中死者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在1939年在波兰军队抵抗德军的战斗中牺牲，一些成为德军的战俘，一些成为俄国人的战俘（在卡廷），还有一些是与波兰人一起战斗的抵抗战士，在华沙和其他地方战斗，一些则是在北非、意大利和北欧的盟军战士，另外一些则是战斗在东方战线上的苏联军队的一员。

梅尔特查克列出的7890名士兵名单包括士兵西蒙·赫梅莱夫斯基，1940年在波兰军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于法国；医学长官齐格蒙特·弗斯坦迪什，1940年在卡廷被苏联人杀害；上尉大卫·科尼西斯泰因，1944年在华沙波兰人反对德国人的起义中牺牲；以及萨金特·斯穆尔·卡普，1946年在凯尔采集体迫害中被波兰人杀害。梅尔特查克的名单是一幅犹太人参战、爱国和受苦的全景画。

1996年，在阿姆斯特丹，考瑞伊出版了《死亡在黄色中来临》（Felicja Karay, *Death Comes in Yellow: Skarzynsko-Kamienna Slave Labour Camp*），此书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不仅对那个恐怖的劳动营，而且对整个劳动营系统做了全面介绍——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有437个劳动营。在斯卡日斯科-卡缅甸劳动营，20,000名犹太人（其中大都是妇女）中有14,000人被杀：占70%。

2000年，《东欧犹太事务杂志》（*Journal of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出版了欧尼尔（Robin O'Neil）编辑的一份全面的清单，记载了从加里西亚境内被驱逐到贝乌热茨的犹太人。同一年，引人注目的《德国犹太人在巴特·基辛根的兰克雷斯最后痕迹》（*Letzte Spuren: Von Deutschen jüdischen Glaubens im Landkreis Bad Kissingen*）以德语和英语出版。这本著作由宾德尔和门斯编辑（Cornelia Binder and Micheal Mence），此书对一些文献和照片做了重新整理，详细介绍了从德国中心地区一个小地方被驱逐以致最后消亡的那些犹太社团的情况。它还逐个城镇逐个村庄地列出了被驱逐者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他们被驱往的地方（主要是里加、罗兹、特莱西恩施塔特、索比堡、伊兹比察、明斯克和奥斯威辛）。作者在8月27日给我写信说：“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纪念，而且要把这些名单作为识别德国犹太人的起点之一……把他们的名字和生活记录下来。”

最近几年，一些人为了记录幸存者的“名字和生活”而付出巨大努力。米德（Benjamin Meed）在编撰美国的纳粹屠犹幸存者登记表扮演了核心角色。幸存者在写作和出版回忆录方面也比以前更加多产，他们通常都受到早期回忆性作品的鼓舞。这些早期作品包括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Primo Levi, *If This Is a Man*, 1945年意大利语版），米德的《在墙壁的两边》（Vladka Meed, *On Both Sides of the Wall: Memoirs of the Warsaw Ghetto*, 1948年意第绪语版；1972年英文版），以及威塞尔的《夜》（Elie Wisel, *Night*, 1960）。最近几年，那些不为人知的“隐藏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或者独自隐藏起来的年轻的纳粹屠犹幸存者——也开始写回忆录。1998年，基斯流克出版《被揭示的阴影》（Ingrid Kisluk, *Unveiled Shadows: The Witness of a Child*），他生于维也纳，战争期间住在比利时。同一年，温特的《列车》（Miriam Winter, *Trains: A Memoir of a Hidden Childhood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出版。她父母把她交给波兰一个基督徒家庭时她才8岁。

在过去20年中，获取口述证词的项目取得有力发展。从1979年起，费洛克（Laurel Vlock）的纳粹屠犹幸存者纪录片工程，为录像形式的口述历史树立了榜样。该纪录片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纳粹屠犹证词福图诺夫档案（Fortunoff Archive）的一部分，她也是这一档案的共同

创始人。截至今年，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纳粹屠犹幸存者影视历史基金会已经录制了 50,000 多份证词。许多幸存者都把证词给了个别历史学家。在我 1996 年出版的《男孩们》（*The Boys: Triumph over Adversity*）中，我能够从 150 多名幸存者的书信中引用材料。战争结束时，这些幸存者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写信给我讲述了他们战前、战中以及战后的生活。另外还有 50 多名幸存者为了帮助我完成《战争结束的日子》（*The Day the War Ended*），给我寄来了他们个人关于 1945 年前 5 个月情况的回忆。我还把这些幸存者的证词作为我的通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和《二十世纪历史》（*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一部分。每位历史学家都能够从那些幸存者的回忆中得到认识和理解纳粹屠犹的关键元素。

现在，我要以个人反思来结束今晚的讲演。我想这种反思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威塞尔曾就此明确声明，不管那些没有经历过纳粹屠犹的研究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明白这种感觉，现实最终是无法理解的：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真正接受、理解和想象实际的暴行。25 年前，我读到战争刚结束在华沙写的一封信，是一位幸存者写给巴勒斯坦一位朋友的，它由犹太代办处于 1946 年在一份模板印刷的公告中发表，以便让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了解纳粹屠犹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在伦敦外务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抄本。在一张碎裂发黄的纸上，这位幸存者写道：

我寄给你我养女的一张照片。好好看着她，记住：这样的孩子都会被扔进焚尸炉。想象一下吧，我的图尔西亚是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但是成千上万像她一样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面前被拖走，然后都在毒气室中消失了。

除非有病态的想象力，你才能想象得到这种情况。但如果你是正常人，就算动用所有想象力，你也绝不可能把这种恐怖想象进自己的生活。

在战争进行时，一位美国拉比萨泼斯坦（Harold Saperstein）在 1942 年 9 月 11 日犹太新年的前夜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²⁹ 纳粹摧毁了离布拉格不远的捷克村庄利迪策，在那里杀害了 300 名捷克人，来为他们被暗杀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统治者、党卫军将军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报复。这一消息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消息同时进入美国，在战前曾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旅行过的拉比萨泼斯坦在他的集会上这样说：

不用说，我们犹太人中有上千利迪策人。一个个社区被毁灭。那些我了解的，我曾经在那里散步、聊天、礼拜过的社区现在没有一个活着的犹太人。纳粹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彻底灭绝欧洲犹太人。

幸运的是，人类的想象力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想象得到新闻中揭示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放逐和驱赶、能够真正想象得到那些伴随着隔都出现而出现的饥荒和疾病的无情进攻、并能够真正想象得到残酷屠杀的话，我们就无法再正常生活了。如果我们还笑的出来的话，我们就不是人了。更何况，报道的这些消息还只是对真实情况的轻描淡写。

我们仍在吃饭、睡觉——也还笑的出来。因此我们或许尚未彻底领悟这些恐怖行径，从而保全了自己。但纳粹屠犹绝对是犹太人永远无法释怀的一个负担。然而，就像在摩西时代一样，奴役之后是新生。

²⁹ 这些布道以 *Witness from the Pulpit: Topical Sermons 1933-1980* 为名于 2000 年在纽约出版。由拉比萨泼斯坦之子 Marc Saperstein（乔治·华盛顿大学犹太研究项目的教授）编辑和笺注。